

译者的话

强大的国家与发达的市场

——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讨论：经济学的永恒话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 郑秉文博士

1992年我刚刚做完博士论文《市场缺陷分析》的答辩，就赴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让·莫内学院做博士后研究。行前，到北京大学拜访胡代光先生时他嘱咐我：若碰上好的资料，就给他复印一些寄回。由于一直进行市场失灵——如外部性、公共产品等——课题的研究，所以，对刚刚在国内读过的中文版斯蒂格利茨的《政府经济学》与其几个英文版著作印象非常深，可以说，在我能接触到的英文经济学文献中，斯蒂格利茨是对我影响较大的几个西方经济学家之一。

恰巧到法国不久在巴黎 DAUPHINE 大学图书馆里读书时碰到了斯蒂格利茨的另一本著作——就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于是，我立即复印了两份，一份如约求人带回国

内送给胡代光先生，一份自用，并打算日后译成中文出版，将这本书献给中国的同行。可是，自 1995 年回国之后，一直忙在行政事务堆里，翻译出版的事便搁置起来；直到上个月看报得知斯蒂格利茨将于 7 月 20 日来华讲演，才猛然想起并下定决心求助于我的朋友欲以最快的速度在斯蒂格利茨来华之前将之译出并出版。这就是六年前我的“法国梦”今天得以实现的经过；也就是斯蒂格利茨这本九年前出版的书而今天才译成中文的过程。

虽然今天出版的是斯蒂格利茨九年前的著作，但读起来感到还是那么贴近。这不仅仅是因为在法国做博士后研究报告时曾参考过这本书而有温故知新之感，而且是因为这本书确是一部经典性著作；也不是由于我在法国期间曾因为与他有过几次书信来往而对这本书情有独钟，而是因为这本著作所论述的主题——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的一个十分古老但又永新的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九年后面临经济转型的中国今天，尤其是金融风暴冲击下的亚洲国家纷纷调整各自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九九八年，我们重读这部著作，对国家的经济角色的理解似乎更有新鲜感、更深刻。

斯蒂格利茨的这部著作及其附后七位经济学家和一个记者对他的评论（见书末附录），主要是围绕国家干预与自由市场关系这个命题展开的。

事实上，这个讨论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时期中出现的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重商主义”时就已经开始

了，至今大约已有 500 年了。那时，人类社会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将要建立，其商业资本的发展壮大不断要求扩大国内社会分工，统一国内市场，开辟海外市场；为此，商业资本要求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消除封建割据，建立市场秩序，促进海内外贸易。后来，随着市场的扩大、需求的增加、机器的革命，商业资本开始向工业资本转变，与之适应的，是国家干预开始向自由放任转变，其标志是 1776 年亚当·斯密出版的《国富论》。

斯密对国家的作用和政府的动机表示极大的怀疑，在其“自私的动机、私有的企业、竞争的市场”这个自由制度的三要素基础之上，他规定了国家的三个任务：提高分工程度，增加资本数量，改善资本用途；由此，认为不断增加国民财富的最好办法就是给经济活动以完全的自由，无须政府进行干预；进而，对政府的义务作了三点限制：保护社会，使之不受侵犯；保护社会上的每个人，使之不受其他人侵犯；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设施。将上述归纳起来便是一幅“看不见的手”支配的社会经济的景象，而政府则成为一个守夜人。产业资产阶级的现实要求与自由放任的政策理论，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斯密学说征服了整个欧洲一百多年。

本世纪 30 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了西方经济学说的一次重大转变，即占统治地位一百多年的斯密自由市场经营论为中心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让位于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虽然凯恩斯总体上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是一个有效的机制，它能保证个人自由并激发个人释放其创造性，但他承认市

场本身存在缺点，只有扩大政府机能才能改正市场缺点，以保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简而言之，凯恩斯是按如下三段论演绎的：一、自由放任经济中的缺点主要是存在失业；二、存在失业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三、有效需求不足是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造成的（即心理消费倾向，心理灵活偏好，心理上资产收益预期）。因此，凯恩斯认为，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的继续存在，就等于听任失业与经济危机的继续存在；他认为，政府必须采取财政措施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弥补自由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的思想体系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证明了市场缺陷的存在，构成了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理论核心，影响了一代经济学家并且，一直到 70 年代，人们称之为“凯恩斯时代”，将他称之为“战后繁荣之父”。

70 年代初的西方经济危机不但宣告了“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的终结，而且还破天荒地出现了西方经济危机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奇特经济现象：滞胀。凯恩斯主义对此已完全无能为力：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解救危机，就必然给通货膨胀火上加油；若采取紧缩政策去抵制通货膨胀就势必加剧其经济危机。于是，西方学者逐渐怀疑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政策，开始向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制度“复归”：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货币主义、以拉弗尔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华莱士等为代表的合理预期学派、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学派、以加尔布雷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公共选择学派等等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活跃起来，简而概之，他们的基本经济

主张是：(1)古典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是正确的；(2)资源的有效配置只能由市场来执行，任何市场以外的力量都不能代替市场的作用，而只会起破坏作用；(3)即使市场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缺点，但克服与纠正市场缺点的唯一办法在于通过产权明晰等措施来予以完善，决不能依赖市场以外的政府干预；(4)恰恰相反，以往之所以会出现市场失灵，其原因正是由于政府干预的结果，而不是市场自身的原因；(5)政府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与“市场失灵”相对应，他们提出了“政府失灵”或公共失灵理论。明确指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任何干涉肯定都是一件坏事，而不是一件好事。

在主张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这两大对立的经济思潮兴衰交替的几百年经济思想史中，上述勾勒的仅仅是极其简要的一条几次换位与回归的轮廓而已。事实上，在西方经济理论体系内部一直存在着干预和反干预以及由此造成的各种矛盾和不调和之处，尤其是本世纪以来。十几年来，斯蒂格利茨教授在西方经济学者中一直是以“干预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而著称的。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1943 年 2 月 9 日生于印第安纳州加里，1964 年在阿墨斯特学院取得学士学位，1966 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67 年至 1974 年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74 年至 1976 年任斯坦福大学以琼·肯尼命名的经济学讲座教授，1976 年至 1979 年任牛津大学以德拉蒙德命名的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1979 年至 1988 年任普林斯顿

大学教授，从 1988 年开始至今一直是斯坦福大学以肯尼命名的经济学讲座教授。其中，1993 年至 1997 年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后两年任委员会主席，1997 年至今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负责经济开发工作的资深副行长。

斯蒂格利茨可以称得上是他这一代人中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始终一贯地支持政府干预的经济学理论，给人们尤其是中国学界以深刻的印象；他著述颇多，至少出版和发表了六本专著和 100 篇以上的论文。1979 年曾获美国经济学会专为 40 岁以下青年经济学家设立的克拉克奖，曾于 1996 年访华并与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进行了会晤。

在斯蒂格利茨那里，政府经济作用一直被划分为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即生产方面的作用是要回答“怎么生产产品”的问题，消费方面的作用是解决“生产什么”“为谁生产”等问题。

在生产方面，人类消费的产品分为两类，即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在私人产品市场方面，政府不应直接进入市场以一个竞争者进行生产，而应采取“间接”的生产方式，即透过提供法律服务、信贷服务和提供公共产品服务这三个“服务方式”进行“生产”。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承担责任进行生产（交通基础设施、港口、机场等），一种是以“政府采购”的方式从私人部门进行购买。也就是说，政府在消费方面的作用可以把政府支出分为收入再分配的支出和政府采购的支出这两个方面。

在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愿意自觉遵守现行法律的前提下和私人厂商自愿（与政府）签署合同的条件下，政府有足够的理由和能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因为与其它别的经济组织相比，政府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她代表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性；一是她具有强制力，例如制定纳税法律，要求社会保障的覆盖率，等等。由于市场的“常态”是信息不完善性或市场的不完全性，所以，大量的市场失灵现象就为政府干预市场以提高整体福利水平提供了空间；斯蒂格利茨认为，市场失灵的具体例证表现为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尤其是自然性垄断等；而这些市场失灵现象就基本上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

市场之所以会出现失灵现象，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信息不完善，一是市场不完全，即存在不完全竞争。就后者来讲，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竞争的市场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它仅是经济分析中的一个假设前提而已。就前者来讲，由于信息不完善，成千上万的企业“事前的”分散决策很可能会导致“事后的”重复生产和无效率，从而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所以，说到底，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那么，谁来对市场负责呢？

对这个问题，斯蒂格利茨反对科斯的主张，认为，科斯提出的“自愿联合”或称“协商解决”是不可能实现的，诸如解决大气污染等外部性问题涉及到一系列的产权明晰难题，更重要的是这种“私下解决”的办法克服不了“搭便车”问题，如此高昂的交易费用将会导致无效率。与其自愿联合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去负责这个“市场问题”，就不如简化地把“现成”

的政府看成是为此目标而设立的一个集体性组织，这样更能节省交易费用。为此，斯蒂格利茨明确地提出了一个“非分散化基本定理”，这个定理与科斯定理的主张恰恰相反，认为市场要依靠政府的调控，依法调控比罚款更好，否则，“如果仅仅简单地公布一罚款，那么怎能知道会导致多少污染呢？”简单地说，“非分散化基本定理”认为，没有政府干预，就不能实现市场的有效配置。但对政府的市场调控效果要注意两点：不要高估政府直接调控的效果，同时，也不要低估间接调控的能力。

既然政府干预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就要回答政府如何干预的问题——这也是个有争论的热点问题。尤其在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要区分“政府提供”与“政府生产”这两个概念：在私人产品市场上，一般来说由私人部门予以提供和生产；但在公共产品的“市场”上，或是政府建立企业，亲力亲为，进行“政府生产”或者间接生产称之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于公共大众，符合公共利益，而以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标的私人部门的企业行为显然与公共利益是不一致的。斯蒂格利茨认为，既使对这些企业（例如铁路）进行了国有化改造，也不可能使其行为符合公共的利益，因为，从理论上讲，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不完全竞争的现实中，私人部门的价值取向显然难以实现公共部门应具有等诸多社会目标，所以，要解决公共目标和私人目标先天的不一致性，国有化运动不是一条必由之路。相反，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私有化基本定理”，其基本含义是：在

私人部门不能实现政府政策目标的情况下——例如提供公共产品，政府可以透过签订合同、授予经营权、经济资助、法律保护等手段和途径，委托私人部门生产并提供，政府只要指定“生产多少”就可以了；适用于这一类的公共产品主要包括具有规模经济性的自然垄断产品即大部分为基础设施和一部分公共服务行业，如自来水公司、电话、供电、电视台、灯塔、新闻、垃圾收集、街道照明、甚至医疗卫生、教育、图书馆管理、公园管理、等等。在谈到拍卖电视频道时，斯蒂格利茨说这是“好经济学”，但在谈到私有化时，认为这是“坏经济学”，他持否定的态度；他为克林顿政府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坚决反对将一个生产铀的公司私有化，既使到今天，他还坚持不懈地利用其自身的影响，竭力推迟其私有化的进程。他始终认为，私有化运动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市场需要政府某些合适的干预形式。但政府干预的结果绝不是十全十美的，它的副作用主要是产生浪费和无效率。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是一种自然垄断性组织。根据莱本斯坦的研究，垄断条件下的任何组织都有可能丧失追求成本最小化与效益最大化的能力，从而导致“X 非效率”的产生，这是在竞争条件下受“庇护”的垄断者的基本行为特征之一。但只要引入创新、激励与竞争精神，就会提高效率，就会使公共机构对其服务对象的服务效率得以提高。由于可见，不完善信息与不完全市场不但导致了市场失灵，同样也是导致“政府失灵”的根源。

正如人们对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评价那样，作为“明星教

授”，“他是他那个专业的巨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他将来很可能获诺贝尔奖”（见书末的《附录》）。他的经济理论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也有一定的影响，甚至有时使世界银行行长沃尔森也感到很“难堪”；对亚洲国家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坚持要求其提高利率、关闭破产银行、减少政府开支等紧缩政策，他坚决持相反的态度，并发表了独特的见解。国际货币基金的政策主张是，提高利率可以吸引外资的流入，由此可以恢复信心，促使当地货币升值，促进国家恢复正常。但斯蒂格利茨则认为，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信息不完善，在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提高利率就会很可能使投资者难以判断投资回报预期是否安全，使人们认为有可能偿付不起如此高位的利率，其结果必将是资金不流入、汇率不回升、经济不复苏。

本书下篇里的七位经济学教授对上篇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论文分别所做的七篇评论，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对斯蒂格利茨关于政府经济作用问题的观点进行了富有成效地、精彩地讨论，见仁见智，发人深省。

关于国家与市场、国家干预与市场失灵等，笔者以前曾做过一些探讨^[1]。

市场失灵的存在为政府的介入提供了可能性，但市场的作用却是政府无法替代的。前计划经济国家“市场恐惧病”导致的后果是世人皆知的。对前苏联东欧国家解体的原因，曾有人说是由于政府软弱从而导致了退却而造成的，但归根结底，是由于市场的原因，即由于害怕市场倒因无市场而搞垮了

自己。

至于说国家的作用，她始终是一个客观存在：越来越强大起来。可以说，今天各国政府对经济各个领域甚至个人生活的影响程度和深度比古希腊时期甚至比一百多年前都有一个巨大的、不可同日而语的变化。一百多年前德国的瓦格纳^[2]在对几个国家的公共支出情况作了考察之后提出的“瓦格纳定理”就曾预言：进入工业化以后，经济中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比例上仍将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公共支出将不断膨胀。这一规律在 50—100 年以后仍将发生作用。后来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都验证了瓦格纳定理。

皮考克和魏斯曼^[3]经过考察英国 1890 年以后的资料验证了瓦格纳定理，发现英国公共部门的膨胀过程是呈现出一种“阶级式”的形状，而非“连续性”的增长。鲍莫尔^[4]经过研究之后则从另一个角度给予了验证：工业化的结果之所以导致公共支出的增加是因为先进技术并不能象私人生产部门那样随着技术革新的进步就可能立即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能够减少劳动人员。萨缪尔逊^[5]对战后美国公共部门膨胀的历史经过研究之后预言道，在将来的岁月里，不管那一个政党执政，政府支出上升的趋向多半会继续下去，并将至少占 GNP 的 25%。美国著名财政学专家马斯格雷夫^[6]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英、美、德三国的公共支出结构的变化作了考察。其结果总的来说，西方公共部门发展的趋势与瓦格纳的预测是相吻合的：公共支出占 GNP 的比率英国从 1890 年的 8.9 上升到 1955 年的 36.6%；美国从 7.1% 上升到 1962 年的 44.

1%。

后来，马斯格雷夫于 1984 年又对几个国家公共支出的规模作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 6 个西方国家中，美国 1980 年度公共支出占 GDP 比率最小，为 36%，瑞典最高，竟达 61.5%。比较经济学家普莱尔将战后东西方社会福利开支作了比较，发现不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福利开支呈现出膨胀的趋势，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开支也同样在默默地遵循着这个规律，所不同的是它的增长速度稍低于西方国家。

如何解释 100 多年来世界经济史中持续出现的这个瓦格纳现象？我们固然可以从凯恩斯主义那里找到一连串的现成答案 刺激需求、扩大市场、稳定就业、对付危机、反衰退、调节经济，等等。从国家宏观需求管理和战后国家行为结果的角度来看，这些解释无疑是正确的，它确是国家实施凯恩斯主义的“主观动机”的必然结果，是福利政策的必然结果。除了政府实施凯恩斯政策这一重要因素以外，诸如政府面临强大的政治压力（如院外集团）和社会压力（如工会谈判）使社会福利具有明显的刚性的特征，“冷战”的国际局势和频繁的局部战争所导致的军费开支增加，等等，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多或少都对瓦格纳现象起了这样或那样的决定性作用。

上述经验性的分析与实证研究似乎对瓦格纳现象作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但从规范经济分析出发，即从市场失灵理论的角度来研究公共产品，似乎给出的答案会更令人满意。

自由市场制度是建立在交换的等价原则之上的，只有那些具有排斥性质的可资交换的财产权力的产品才能进行市场

交易；与私人产品不同，公共产品不具有这些性质，所以公共产品的交换行为难以产生，消费者与供给者之间联系由此中断，虽然存在市场需求，但却没有市场供给，这时，政府应予以介入，提供这种产品，弥补市场的这个局限性。

可是，公共产品具有两个内在特性，这两个内在特性决定了政府介入之后公共支出不断膨胀的趋势。

第一个内在特性是，公共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 1。恩格尔定律告诉我们，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等“生理需要”的开支比例越来越小，而用于非生活必需品等“精神需要”上的开支比例将越来越大。简言之，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需求越来越高；而公共福利产品的收入弹性一般来说大于市场私人产品，即公共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 1，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现代社会的公共产品不属生活必需品，而越是非必需品，它的收入弹性就越大，当个人收入超过一定水平时，公共产品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就需要越来越多的政府服务，这时，医疗保健、文体设施、交通运输、社会保险、公共安全等优效型公共产品就开始日益“侵蚀”和“挤占”消费结构中的私人产品的相对份额。公共产品的社会需求的不断提高，成了推动公共支出不断膨胀的原始动力。

第二个内在特性是，公共资本存量与私人资本存量之间有一种密切的内在函数关系。战后以来西方国家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每一次胀或缩无不刺激着或影响着私人投资趋势的波动，从而对宏观经济的总量运行发生着巨大作用。在这

方面，美国经济学教授阿斯乔作了有益的探索。我们知道，公共投资的增长对私人投资有两种影响，一是刺激私人扩大投资，即被公共投资“挤进”资本总量，一是当国家总投资（私人与公共投资之和）超过一定水平时被公共投资“挤出”，即私人资本将减少。阿斯乔认为，从长期来看，“挤进”的影响占支配地位，经过计算，其结果是公共投资每增加 1 美元，私人投资约增长 0.45 美元。在对美国州与州之间以及其他 7 个国家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比较之后，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

在美国 1950—1988 年近 40 年的公共投资曲线中，前 20 年（1950 年—70 年代）是呈上升趋势的，后十几年是下降的。为了更准确地考察公共投资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结果，阿斯乔对这 40 年公共投资曲线的 2 个不同阶段里的要素生产率，私人资本收益率、私人投资率这三个数据进行了运算，其结果惊人地显示出它们的变动情况与国家公共投资的规模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要素生产率来看，在公共投资上升阶段要素生产率为 2.8%，下降阶段为 1.4%，在下降阶段要素生产率损失的 1.4% 中，至少 57% 或每年 0.8% 是由公共支出减少引起的。而私人资本收益率和私人投资率在公共支出扩大阶段分别为 10.7% 和 3.8%，而在公共支出下降阶段分别为 7.9% 和 3.1%。阿斯乔指出，象公路、街道、机场、排水和供水等基础设施的国家投资，是与私人投资相互补充的，不注意国家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将严重阻碍整个经济的运行^[7]。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如果失衡，将会严重地对社会经济

的发展产生“滞后”的负影响。阿斯乔的研究成果表明，美国战后以来前 20 年经济增长率之所以能够达到 10% 以上，是因为国家扩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后 20 年经济增长率之所以持续下降，其主要原因在于公共设施的投资净额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阿斯乔看来，甚至经济周期的发生原因也可以用公共投资存量的变化来解释。可以这样认为，公共资本存量与私人资本存量之间的这种内在函数关系，是公共支出日益扩大的客观要求。

公共产品上述两个内在特性告诉人们，公共支出和公共部门不断膨胀的趋势首先是由于政府干预市场、纠正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所导致的结果。换句话说，国家的强大，既是其校正市场失灵的前提与能力的表现与基础，同时，也是干预市场的理性要求与客观结果。

其实，早在瓦格纳之前，马克思^[8]就已经预料到，用于“公共需要”的那部分“扣除”（指公共产品）将会日益膨胀；他指出，在应扣除的那部分中须划成三份：1.“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2. 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3. 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马克思明确预言道，用于满足“共同需要”的那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今天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支出的膨胀与公共部门的强大，其原因，马克思早就作了解答。马克思的预言已经得到了实践的印证，并将继续得到未来发展的印证。

战后以来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政

府干预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诸如垄断、外部性、失业等微观层次上的市场失灵迟早要反映到通货膨胀、总供给与总需求等国民经济宏观总量失衡方面，于是，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与干预力度的选择与组合情况就决定了克服微观市场缺陷的效果与程度。因此，西方国家的主要问题一般来说虽然发生在微观层次上，但解决问题的关键往往在宏观管理方面。与之相反，前计划经济国家由于排斥市场，在实行改革之后，发现几乎在微观层次上的所有领域内都表现出缺乏创新与活力，经济推动力几乎趋于枯竭。

一面是成熟的、发达的市场，一面是日益扩大的政府经济干预；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这种“共生现象”的产生与存在确实是值得研究的，因为毕竟“现象”与“本质”一定具有某种关联性，我们应该从中找出内在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

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

注 释

[1] 郑秉文：《市场缺陷分析》，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年。

[2] Wagner A: Three Extracts on Public Finance, Musgrave and Peacock(eds):Classics in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New York, Macmillan Co. . 1958.

[3] Peacock, A T and Wiseman, J: The Growth of Public Expenditure in the United Kingdo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67.

[4] Baumol, W J: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Jun.57, P.415 - 426

[5] 萨缪尔逊：《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2 年，上册，第 207 - 208 页。

[6] Musgrave R A: Fiscal Systems,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Chapter 3.

[7] 上面材料引自阿斯乔：《基础设施：美国的第三种赤字》载于《世界经济译丛》，1991 年 10 月号第 16 - 21 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 9 - 10 页，1972 年 12 月。